

红色文化视域下的广东与长征

韩洪泉

摘要: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居于特殊地位、产生深远影响。长征文化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加强长征文化建设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建好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重要意义。广东与长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决策地,是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福建后转战的第一站和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的主战场,同时也是长征部队的重要补充地、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和长征文化的重要积淀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广东的地位和价值都是非常特殊和无可替代的,“万里征途第一站”“胜利突破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统战工作功绩道”等更成为广东长征文化资源最鲜明的标签和最集中的领域。90年来,广东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坚实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来了宝贵的机遇。新时代的广东长征文化建设要继续往开来、扬长补短、守正创新,必须要在聚焦重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考察视野,在内部协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合作,在实践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创造新的成就。

关键词:长征文化 红军长征 长征精神 红色文化 广东

1934年至1936年的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产生深远影响。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带”,既书写下一部惊天地动地的壮丽史诗,也熔铸起一座巍峨立体的精神丰碑,又积淀为一脉厚重深沉的红色文化。广东与长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长征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决策地,是离开中央苏区后转战的第一站,是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的主要战场,同时对长征部队的补充、长征精神的熔铸、长征文化的积淀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广东的地位和价值都是非常特殊和无可替代的。从红色文化的视角对广东与长征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广东在百年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为新时代推动长征文化传承发展、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提供有益镜鉴。

一、广东在长征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东的地位比较重要。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决策地,是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福建后转战的第一省区和连续突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的主要战役地,是中央红军人力物力的重要补充地,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和长征文化的重要积淀地。下面从四个方面予以概述。

(一)广东是战略转移的重要决策地 实施战略的战略转移,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到准备再到实施的历史过程。进入1934年以后,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紧急迫召开考虑进行战略转移的会议。1934年4月广东保卫失败后,局势更趋恶化,中共中央于6月2日通过在上海的台向共产国际报告,提出了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方案。这一方案在长征前夕获得共产国际的同意。但在战略转移突围方向的选择上,广东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广东军阀陈济棠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赣南参与“围剿”中央红军,另一方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积极寻求与红军接洽和谈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打破敌军“围剿”和为战略转移创造条件,对陈济棠的谈判要求作出积极响应。据时任赣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回忆,在1934年5月下旬,中革军委就与陈济棠谈判让出江西西进道路等问题,给各军团发出了通知电,“在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委加紧同陈搞统战工作的真正意图,在我们去同陈的谈判,尤其在其开始前后,才明白让出江西进路的奥妙,尤其是我们党红军找出路。”长征前夕的10月5日,朱德、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到江西寻乌罗塘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密谈。此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们交代任务和联络密语,叮嘱他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经过数日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援助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包括红军有行动时事先要通报陈济棠,陈部后退撤20公里。这就为中央红军的长征突围准备了有利条件。谈判期间,中央代表已最终作出战略转移决策,周恩来也向我方谈判代表发来“你喂的鸽子飞了”的密电汇报。何长工等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后,周恩来高兴地指出,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1934年4月至6月间,在会昌宣传和指导工作的毛泽东,对于稳定中央苏区南线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多次指示赣粤省委书记刘晓和何长工,要善于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打出一个和谈的局面。这些因素,都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和部署,以及长征初期比较顺利地通过敌人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广东是部队突围的首选战役地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开始突围转移后,入赣粤军就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广东省境也成为顺理成章的进军方向。1934年10月21日至11月15日,中央红军连续突破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广东也因之成为突围部队的首选战役之地。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该道封锁线系粤军(围攻中央苏区的南路军)为阻止红军进入广东而建立,在江西赣州以东沿桃江(信丰河)向南,经大埠、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成。中央红军决定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封锁,向湘南前进,并在突围前将要经过的地点通知陈济棠。但陈并未来得及提前向部队了解其意图,因此红军突围之初战斗相当激烈,其后才在陈的示意下稍事抵抗后即行撤退,让出中间大道。红军主力随即向信丰东南地域前进,25日先后从信丰南渡过桃江,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并继续向西挺进。25日红1军团一部进入广东南雄境内的界址,26日拂晓红军团直属侦察连在乌迳的新田与敌遭遇并将其歼灭,新田之战也成为红军长征进入广东后的第一仗。至28日,红1军团大部经乌迳、新田、钵钵、上河、夹河口、茶园、山背、黄陂洞等地,到达江西大兰的兰村,另一部进入南雄境内的黄地,大兰后再转入兰村,两部会合后沿梅岭北麓山地向赣粤湘边开进;红9军团紧随红1军团之后,经界址尾随红1军团路线跟进至平田坳、兰村地区。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电令南路军和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桂东、汝城、城口间构建第二道封锁线以阻止红军西进。中央红军决定沿赣粤湘三省边界前进,主力分三路纵队,由湖南汝城、广东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10月31日,左纵队的红1军团第2师前鋒连别动队、第4团、第6团进入广东仁化县长江的冷饭坑、犁壁岭等地,至11月初红1军团部直属队、红15师和第9军团等部也先后进入仁化县境内。11月2日,红2师4团占领三江口,截断湘军与粤军的联系;红6团于当晚发动突袭,攻占第一道封锁线的中心据点油坑,此战也标志着红军主力突破了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4日至6日,红6团1营在铜鼓岭与准备北上阻截红军的粤军一部发生激战,以伤亡100多人的重大代价击退了敌军攻势,为部队争取时间短暂休整,顺利过境继续西进创造了条件。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该道封锁线系蒋介石为阻止红军突破前进,在粤汉铁路粤边线、良石、章江、乐昌之间所构建。11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继续分头西进。5日至6日,红1军团、红5军团、红9军团和军委纵队分四路进入广东乐昌境内。6日,红1军团2师4团抢占九峰山制高点,并派出部队阻击茶寮一带国民党军,经10余小时激战,将其牵制于九峰山麓以南,从而掩护军委两个纵队和红9军团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以北的安全通过。随后,红1军团越过大王山,占领湖南宜章的石迹渡。1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乐昌县境,进入湖南境内。至15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除在突破三道封锁线的作战中先后进入广东的南雄、仁化、乐昌外,红1、红9军团小股部队还曾在1934年11月中旬进入广东连县(今连州市),并在天光山和三水山交界处、夏黄等地与敌军发生战斗,11月23日取道蓝山大桥进入湖南湘江与主力部队会合。12月间,湘江战役中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34师余部也曾进入连县一带活动,直到1935年春才离开连县进入湖南宁远、蓝山。此外,1934年8月间,西征的红6军团一部迂回进入连县山河、田家、洛阳乡山区;9月间,约300名将士绕道进至连县黄田大坑时,与追击的粤军警卫旅发生激战,当场毙敌3人,旋即当晚转入湖南蓝山。

(三)广东是物资人员的重要补充地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虽然活动时间不长、转战范围有限,但获得了出征以来十分宝贵的休整时机和补充作用,得到了途经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心拥护和大力支援。沿途群众在物资上积极支援红军,为红军磨谷、提供粮食,帮助筹办稻草、蔬菜等各类物资。在仁化,红军得到了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较大的休整,部队一方面高于当时市价向群众购买粮食、蔬菜、柴草等物资,一方面大力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向资本家筹集军需,救济穷苦大众的运动,极大地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城口镇百姓还自发捐赠了很多物资,总共筹集到3万大洋、250多担稻谷。在乐昌五山麻坑宿营时,新屋村农民邱宝生帮助红军渡夜渡石碾谷20多担,村中没有走的妇女和老人也积极帮助红军碾米、做饭。许多群众还积极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提供情报。不完全统计,在仁化境内有31人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和介绍情况,长江、城口、红山等地有1000多人主动为红军服务。

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红军长征过广东时并没有直接进行大规模的扩红活动和人员补充,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长征红军的部队中,广东籍将士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广东现有11个原中央苏区县,包括梅州市的大埔县、平远县、兴宁市、梅县、梅江区、蕉岭县、丰顺县、五华县,韶关市的南雄市,潮州市的饶平县,河源市的龙川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以粤东地区为主的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发挥了战略基地作用。据统计,从东江革命根据地调入中央苏区担任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就有梁锡祐、古柏、罗辉、张瑞瑜等10余人,同时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提供了兵源方面的有力支持。这些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中的重要骨干力量。据广东党史界的不完全统计,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粤籍人员至少有63人,包括叶剑英、邓发、罗明、李坚真、萧向荣、谭甫仁、曾国华、陈德等。其人数虽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相对较少,但其骨干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对红军长征以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四)广东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 长征书写了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熔铸了巍峨屹立的长征丰碑。长征精神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长征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广东作为长征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之一。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长征精神在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得到了完美的诠释”。诚然,由于红军长征过境广东的时间较短,并没有像在四川、贵州等地区那样展开复杂激烈的斗争历史和生死存亡的生死考验(如遵义会议精神、四渡赤水精神、飞夺泸定桥精神等),但伟大长征精神各个方面的具体内涵,都在红军长征过广东的历程中得到生动体现,这里也因此成为长征精神熔铸生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有些甚至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环节。比如,全体红军将士听从党的号令,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毅然踏上战略转移之路并紧紧跟随党中央争取最后胜利,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理想信念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比如通过广东期间,红军将士克服重重困难连续作战,先后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首战新田圩、突袭城口镇、伏击铜鼓岭、抢占九峰山,翻越大王山等,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比如中共中央创造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陈济棠进行谈判并成功借道,为长征初期顺利通过敌封锁线创造条件,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比如红军各部队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令行禁止,密切协同,官兵友爱,一切为了最后的胜利服务,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比如,红军经过广东期间,总政治部在颁发的《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中,专门对严守纪律、不侵犯群众利益等提出要求,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积极宣传教育群众、保护群众利益,沿途群众也冒着生命危险支持援助红军,掩护救治红军伤病员,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集中体现了长征精神内涵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广东长征文化资源的类型与蕴涵

广东在长征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这些都为长征文化在广东的孕育生长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广东成为长征文化繁荣发展之地也是广东在长征历史上地位作用的突出表现。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长征文化博大精深、蕴涵丰富,它由特定历史事件中衍生出来,经历了较长时段的演变过程,涵盖了诸多相关范畴和领域,外现为“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历时态”的长征文化,从长征时期直到今天,始终在与时俱进中创造发展。“共时态”的长征文化,就其内在结构而言主要包括长征精神文化、长征物质文化和长征制度文化。广东长征文化资源贯穿于两种形态三重结构之中,形成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累积,“万里征途第一站”“胜利突破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统战工作成功借道”等更成为广东长征文化资源最鲜明的标签和最集中的领域。

(一)厚重深沉的精神文化 所谓精神文化,一般指在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来,人们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念、行为准则等。广义的文化精神文化,是指长征文化中除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之外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长征精神文化是长征文化的核心部分,尤以长征精神最为重要。此外,作为其生动呈现的长征文学艺术,作为其高级形态的长征学术研究,也是狭义长征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广东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熔铸地,对此前文已有阐述,下面再长征文学艺术、长征学术研究等精神文化要素予以考察。

长征文学艺术。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和路上长征路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早期的长征文艺经典,如毛泽东的《清平乐·形势危急》。他在为这首词所作自注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

闷的。”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在长征前夕的心境,其中“战士指南粤”一句,有人认为是为即将进行的长征指路,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后来红军长征确实是从“南粤”即广东方向突围的,毛泽东亦有预先筹划和重要贡献。红军将士在1936年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记》)中,有许多作品都是关于长征初期同粤军作战和长征途经广东的记录,比如《追》(彭加伦)、《泥菩萨》(童小鹏)、《大王山上行路难》(彭加伦)、《粤汉路旁》(童小鹏)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红军长征过广东有关的长征文艺作品多有呈现,如《长征组歌》之《突破封锁线》等。进入新时代,长征文艺中的广东品牌日渐叫响,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长征文学方面,罗宏的《骡子和金子》、庞贝的《乌江引》都是长征题材长篇小说中的力作,其中《骡子和金子》还被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点电视剧目名单,并获第二十七届浙江省委“牡丹奖”等;被改编为现代粤剧《还金记》,在第十三届广东省艺术节中获得包括独唱一等奖、优秀表演奖、优秀编创奖、优秀导演奖、优秀音乐创作奖和优秀舞台美术奖6个奖项,其中有5个奖项排名第一;被改编为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荣获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奖、文华表演奖,并入选“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已在北京、深圳等城市巡演100余场。由东莞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的原创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是我国首部以长征为题材的音乐剧,推向市场后好评如潮,创造了在30多家剧场连演60场的纪录。韶关仁化县以红军长征经过城口镇这一历史背景编排的大型红色歌舞剧《你来啦》,融音乐、舞蹈、情景表演、非遗展示、曲艺、多媒体等艺术形式于一体,上演后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长征学术研究。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在长征学术研究领域,广东省也占有重要一席。根据笔者编纂的《长征论著目录》(未刊稿)所作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出版的长征主题图书(含内部编印的重要资料)2166种,许多都涉及中央红军长征过广东和突破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的内容,其中以红军长征在广东为主题的有19种,出版地在广东省者有63种,作者(编纂者在广东者有22种;截至2023年底发表的长征主题文章(含论文集析出文献,不含长征文艺作品)约有3万篇,其中仅主要以红军长征过广东为题材者就达700余篇,如果加上作者(机构)发行(编印)地属广东省者,以及包含或涉及红军长征在广东者,则数量远远超出这一数据。以长征著者而论,其中有些代表性者有广东省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编《粤北红军标语选》(1981年编印),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工农红军在粤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1986年编印),范朝著《长征“密电事件”始末——叶剑英对张国焘危害党中央的斗争纪实》(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2001年印),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编《伟大的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广州出版社2006年版)、《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编著《寻访长征老红军》(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走过长征路——中央红军老战士黄赞贤回忆录》(2006年编印)、杨浩坤主编《红军战斗在韶关》(《韶关文史资料》第33辑),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编《留住红军的声音》(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李小鲁主编《重走长征路——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社会实践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江冰主编《一个人的长征:罗宏长篇小说《骡子和金子》评论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万里征途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韶关市图书馆编、陈伟清主编《红军长征在韶关》(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梁观福著《工农红军在韶关》(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方腾、邓剑主编《广东红军:红军长征在粤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广东中共党史学会、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韶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广东党史(红)研究文集》(广东省委党史学会2022年版)等等。近年来,广东省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聚焦红军长征过广东史实,都推出了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南方日报》《韶关日报》《源流》等对长征纪念活动和长征文化建设持续跟踪报道,《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广东党史)《红》《广东省委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同舟共进)等刊物都成为长征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等在粤高校以长征为题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呈上升趋势。2014年10月,在仁化县举行了“弘扬苏区精神,促进改革发展——纪念仁化暴动87周年暨红军长征过粤北8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院室宣传教育局等联合主办,在全国产生一影响。2016年8月,成立广东省长征文化促进会,几年来为促进长征学术交流和长征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2019年12月,在韶关市举行了“红军在粤北”研讨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重点围绕红军长征过粤北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进一步推进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二)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一般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创造物质产品的技术等。广义的长征物质文化,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长征和长征的历史过程以及所取得的全部物质成就;二是长征90年来所形成和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如长征遗址遗迹、长征历史文物、长征纪念馆等;三是记述、表现、传播长征文化的各种精神产品的实物媒介,主要包括纸质媒介和其他媒介等。本文以后两个层面的长征物质文化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而广东长征物质文化的遗存虽绝对数量不多但独具特色。据2021年统计,全省有保护文物54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1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32处;已公布的可移动革命文物46件,其中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12件、三级文物33件,这几年来,随着长征历史研究和长征资源挖掘工作的深入,这一数据也在不断刷新。以红军长征在广东主要经过的韶关市为例,境内革命文物资源十分丰富,2021年统计境内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为502处,至2023年已增至1203处,在全市10个县(市、区)都有分布,其中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南雄市有94个,仁化县有94个、乐昌市有78个,其中许多都是长征遗址。位于仁化县的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旧址,在2016年入选20处“我心中的长征纪念馆”之一,同时也是广东唯一入选的长征纪念馆;位于仁化县的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碑,在同年作为广东省唯一代表性图片荣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邮资片。位于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于2017年动工建设,2019年10月正式开馆,为广东省内唯一一座以纪念红军长征为主题的纪念馆。2020年,在全国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片区名单中公布,韶关市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片区的地级市。2021年、2023年,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和红军长征乐昌教育基地先后入选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4年,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又入选第三批广东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长征物质文化既是一种物质的文化遗存,也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对长征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都是长征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广东省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高度重视,长征红色旅游发展如火如荼,长征红色文化开发卓有成效。以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为例,在2019年10月开馆当天即加入全国长征纪念馆联盟。2023年7月,在广东韶关举办了长征文物活化利用座谈会,全国长征纪念馆联盟成员代表围绕长征文物利用阐释与长征精神传承弘扬

进行了深入探讨。据2019年与2023年五一期间接待游客数量统计数据,四年间同比增长113.87%。在乐昌市,2017年在五山镇新发现红军长征战役遗址,2024年又在该镇发现两处红军长征战壕,该市累计已发现长征战役遗址6处。2021年启用的红军长征乐昌教育基地,是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遗址群修缮保护项目的核心部分,也是该市首家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在开发利用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广东省以韶关为重点,通过举办长征主题徒步活动、拓展活动,组织长征主题影片轮播展,举办红色讲堂,拍摄专题纪录片片等方式,长征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快速发展。2023年,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韶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粤游粤红——首届广东红色旅游季”暨“重走长征路”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游客参加。同时,广东省特别是韶关市以长征沿线红色遗址和革命文物为依托,聚焦重大项目,突出文旅融合,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红军粤北长征历史步道示范段(南雄段)、仁化县“园一园一道”(广东省韶关市红军过粤北重大展示园建设项项目、城口-铜鼓岭长征历史步道项目)、乐昌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园一带”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前景可观。

(三)赓续传承的制度文化 所谓制度文化,“是人类在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包含着制定制度的原则、价值和理念等”。作为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和制度文化,不是高度抽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它总是与特定阶级的思想意识、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长征制度文化主要是指长征文化的制度凝结或法制化表现,一般包括在长征和长征胜利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价值理念、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长征制度文化在广东有着丰厚的积淀和具体的呈现,在促进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推动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培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建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对此前文均有涉及。下面仅以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为例作以分析。

纪念活动是一种带有很强政治属性的仪式和象征,长征纪念活动是长征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呈现。广东省的长征纪念活动,包括全国全省的纪念活动统筹安排,一体推进,又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一般与长征出发和胜利逢五、逢十周年的重大纪念日相重合,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益。如1986年组织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报告会等;1996年主办了广东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图片展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书画展等;2006年举行了广东省纪念建军79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军政座谈会;2014年举办了纪念中央红军长征80周年暨《烈火忠魂》首发座谈会等。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10月21日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座谈会,同时在全省特别是韶关市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比如韶关市组织开展了文艺家“重走长征路”创作采风活动,“长征颂歌”文艺展演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诗词书画摄影艺术巡迴等活动15场,举办“红军长征在粤北”主题展览,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党日等等,产生积极反响和良好效益。

重走长征路作为一种仪式感较强的实践活动,既是长征纪念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长征制度文化的生动体现。在这方面,广东省走在了全国前列,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仅在2016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为例,先后到仁化县进行的采访类重走活动的就有:《南方日报》《贵州日报》等长征沿线11个省级党报联合发起的“雄关漫道——党报联盟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报道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全程跟进“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报道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网信办等到仁化作“长征路上奔小康”广东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中共宣部带领多家媒体记者到仁化城口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羊城晚报》组织百名文化记者到仁化“重走长征路”系列采访报道活动等。近年来,韶关以红军长征革命遗址为基础,成功举办过“重走长征路(乐昌、南雄、仁化)”系列徒步活动,其中南雄市已举办四届“重走长征路(南雄段)”徒步活动,“重走长征路(南雄段)”徒步路线贯穿广东省十大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吸引参加红色研学的游客逾30万人次。

三、广东长征文化建设的进路与前瞻

广东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90年历程,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广东长征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短板,在迎来宝贵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如何统筹和加强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努力践行的时代课题。

(一)广东长征文化建设的阶段性回顾 广东的长征文化建设在红军长征时期就已经起步。由于粤东地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在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长征准备和长征出发之际,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创作的文艺作品以及苏区群众创作传播的民歌民谣等,许多都包含着广东地、广东人、广东传播的元素,都可视作为广东长征文化建设的初萌。比如李坚真《广东丰顺》,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任伟养总指导员),她擅长创作和演唱客家山歌来发动群众、鼓舞官兵,被誉为“长征歌手”。在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红军长征记》中,有许多关于广东的精彩篇章,是与陈云(廉臣)《随军日记见闻录》齐名的早期珍贵长征文献,有研究者认为杨定华即系邓发(广东云浮人)的化名。此外,红军长征过广东时期留下的遗迹遗址、标语口号等,也都成为长征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长征文物的重要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的长征文化建设正式起步。1957年成立广东地区革命历史研究委员会,1962年成立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及办公室,专门从事征集整理党在广东活动的历史资料的工作,关于红军长征过广东的历史也在其范畴之内。《星火燎原》《广东文史资料》等曾发表了一些相关回忆文章,但数量不多。长征文物的保护始于新中国成立,如1969年在文化牺牲者的36位红军烈士,在新白修建了“红军长征革命烈士纪念碑”。1972年1月,为纪念红军长征经过地的历史,仁化县特将“烟膏人民公社”更名为“红山人民公社”,后相继更名为红山区、红山乡,红山镇并沿用至今,这也是广东省唯一以纪念长征而命名的乡镇。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政机构相继恢复设立,长征文化建设项目逐步启动,积极行动,高站位部署、高规格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征文化展现形式日趋丰富,长征精神更加深入人心。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2019年,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在韶关市仁化县建成,成为省内唯一以红军长

征为主题的纪念馆。近年来,广东省指导韶关市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有力推进规划工作,多次召开建设座谈会,围绕长征文物发掘保护、红色文化资源开发、“重走长征路”活动组织等,着力把长征文化打造为粤北地区的一张红色名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影响日益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大有后发先至、弯道超车之势,展现出良好发展前景。

(二)广东长征文化建设的辩证考察 广东长征文化建设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各级高度重视、特色定位清晰、实践运用力度大、文化产品质量高等方面。广东省是红色文化大省,共有13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个国家4A级以上红色旅游景区、1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9个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其中,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共三大会议纪念馆、孙中山故居、叶剑英纪念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等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红色景区,可以为长征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形成协同优势。近年来,广东着力打造“万里征途第一站”的长征文化品牌,以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为重点,在“重走长征路”实践教育活动、长征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力度较大、效益显著,在文化产品制作方面推出了《骡子与金子》(长篇小说、现代粤剧)、电视连续剧、赣南采茶戏等,《王二的长征》(音乐剧)等精品力作,充分发挥了后发攻坚优势,初步打造了粤系长征品牌。

广东长征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短板。揆诸当年的历史场域,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东主要是为了“借道西进”,因此并没有深入粤境和过多停留,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广东长征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厚度。以时间而论,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25日进入广东,至11月14日大部队离开广东,只有21天时间,即使加上其他小股部队入粤转战的时间,为时也不算长。以空间而论,中央红军过境广东局限于粤北地区,主要为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三县(市)以及清远的连州市。这与其他许多长征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相比形成了先天的劣势。根据笔者的统计,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与长征直接相关或具有重要关联的共47处,分布于长征途经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示范基地中,与长征直接相关或具有重要关联的共54处,分布于长征途经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广东省均尚无1处。根据《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统计,有31个景区与长征红色旅游密切相关,目前广东省亦尚无1处。此外,广东长征文化建设还存在起步较晚、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近年来虽呈奋起直追之势,但由于主观条件的局限,仍属任重道远。

(三)广东长征文化建设的对策性思考 广东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坚实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来了宝贵的机遇。机遇和挑战并存,新时代的广东长征文化建设必须继续往开来、扬长补短、守正创新,才能不断取得新突破、创造新成就。

一是在聚焦重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考察视野。广东的长征文化建设,聚焦于“红军长征过粤北”这一重点,着力打造“万里征途第一站”这一特色,已经初步产生品牌效应,取得良好建设效益。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拓宽建设视野,才能突破先天不足之瓶颈,奠定长远发展之基础。通过对长征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察,各地长征文化建设各有优势,亦多有缺项,依据各地对长征历程的作用、地位和影响来看,主要从转移决策地、长征出发地、胜利会师地、历史转折地、重要作战地、关键会议地、人力来源地、物资补充地、精神熔铸地、文化积淀地等维度进行考量。据此标准衡量,可知红军长征过广东之先天差距。如果从更开阔的历史视野进行考察,无疑可更好破解这一难题。广东很大一部分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体现在客观上使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重要深层意义上的人力来源地和物资补充地。粤军作为“围剿”中央苏区的南路军,其在江西南部与红军的作战、谈判、让道,也应列入广东与长征的考察范畴。红军团营连是长征的序幕,其目的在于与中央红军长征探路,该军团一部曾进入连县作战,同样应纳入考察范围。此外,从更广泛的历史视野来看,主力红军长征后以广东为主要战役基地的三年游击战争可视作为长征在广东的余绪,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等率领下途经广东辗转上井冈山会师,红7军途经广东进入中央苏区等被称为“小长征”的行动也蕴涵着长征精神的萌芽和长征文化的因子。凡此种种,都可纳入广东与长征的考察范围或开展有价值的比较研究。

二是在实践协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合作。注重加强协同是广东长征文化建设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一方面体现为红军长征过粤北途经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如南雄、仁化、乐昌、连州等,另一方面体现为省对市县以及省内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在广东省包括粤北地区丰富的红色资源中,长征文化资源不但范围较广,而且占比不高,但通过融合发展 and 协同开发产生了良好效益。据统计,在广东省的长征沿线衍生出大量的旅游游踪,包括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1个、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1个、国家A级旅游景区16个(其中5A级2个、4A级3个、3A级1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个、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2个、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1个、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3个、中国传统村落24个、广东省历史文物15个。长征文化有有机融入,实现了双赢的效果。下一步,广东长征文化建设应在进一步走出本省,在加强区域间合作上下功夫。比如可就长征出发决策、寻乌罗塘谈判、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及江西加强合作,就突破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等与湖南加强合作,就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红34师坚持斗争等与湖南、广西等加强合作,同时广东和韶关市应深度参与到长征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重要节点城市组织的共享共建活动中,并从中持续扩大自身影响力。

三是在实践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近年来,广东长征文化建设在挖掘革命文物、建设纪念馆场、开发教学资源、打造精品线路、提升重走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彰显出显著的实践性特征。同时举办多场重要学术会议,围绕红军长征过广东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探讨;加强对长征途经地长征史实的调研考察,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由于广东对长征研究的起步较晚,学术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在2021年修订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1卷,在第一次增加增补了“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内容,作为该卷第3章第5节第目,但也只有不到3页的篇幅。近年来,广东学术界关于长征的研究以及国内学术界关于广东与长征的研究,虽然成果数量纵向相比有了很大跃升,但横向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体系系、有创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尤为欠缺。今后应在实践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整合省内外研究力量,健全专业性研究组织,制定中长期研究规划,从史料整理、整体研究、专题探讨、理论阐释、实践总结等方面稳步推进,为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提供更为坚实的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同时,可视情酌情考虑将广东南部干部学院(中共韶关市委党校)更名为广东长征干部学院(中共韶关市委党校),以便更好整合粤北长征资源,打造广东长征品牌。

(作者簡介:韩洪泉,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法学博士,陆军专业硕士生导师,兼任上海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等,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长征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研究”,出版《长征文化研究》等专著10余部)